

我

陈建功 周国平等◎著

1977

的

國華僑出版社

---

18岁那年，我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。一干就是10年。28岁了，居然又得进考场。

—— 陈建功

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，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。秋色西来，天高云淡，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。

—— 吴 思

要和一脸阳光灿烂的年轻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同时步入大学的门槛，我清楚地明白，自己已经彻底地失去了青春。

—— 肖复兴

今人的“回忆”往往带有过滤苦难、提炼辉煌的性质；而如果念念不忘所谓的“苦难”，又容易被人疑心为“自恋”、“矫情”或者是借苦难来反衬辉煌。

—— 杨慧林

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，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。

—— 叶兆言

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。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，苏醒过来，重新过人的生活——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，一种创造的生活。

—— 周国平

---

ISBN 978-7-80222-238-0



9 787802 222380 >

定价：25.00元

# 我 1977

陈建功 周国平等◎著

# 的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1977/陈建功等著.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7.1

ISBN 978-7-80222-238-0

I.我... II.陈... III.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46916号

● 我的1977

---

编 著/陈建功、周国平等著

责任编辑/郭岭松

装帧设计/武晓强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毫米 1/16开 印张/14 字数/170千

印 刷/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/10001-15000册

书 号/ISBN 978-7-80222-238-0/I·14

定 价/25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址:www.oveaschin.com 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---

---

## 出版说明

1977年冬天，五百多万从18岁到30多岁年龄不等的青年从农村、工厂、牧区、部队、学校和机关，涌向考场，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。1978年7月，又有六百多万人参加高考。

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，两级学生先后迈向象牙塔，为寂落了10年之久的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可以肯定地说，这次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。高考制度的恢复，令千百万被“文革”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，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。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，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。

为了纪念这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考试，中国华侨出版社约请了二十位有着77/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当代著名作家、学者以及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，结集出版。

收入文章按照作者姓氏的汉语拼音排序，不分先后。

---

---

## 1 遥远的高考梦 .....蔡 震

冬日里进了考场,在县中学。进场前,大家聚在操场上,是延河边一块河滩地,碰到许多叫得上名字、叫不上名字的知青,彼此寒暄着,感嘆着。大家都胡子拉碴,肯定几天没刮脸了。那年我二十有七,将近而立之年,在“老三届”的考生中还只能算“中年”。

出了考场,我片刻未留,没同那些认识的人对对答案,只想着四个字:听天由命。

## 13 我妈逼我考大学 .....陈建功

凄清而寒冷的早晨,我、黄博文,还有其他二十几条汉子在微熹的晨光中爬到了一辆卡车上。卡车在裹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,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,山路弯来绕去,我们时而撞向左边,时而拥到右边……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色树坟中学,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,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。

## 17 我的大学之梦 .....高凯军

上山下乡的五年,我伐过木,栽过树,烧过窑,种过地,最后还干了一年多木工活,所经历的可谓是五行八作,样样都有,酸甜苦辣,五味俱全。大悲大喜也主要集中在这几年。所谓悲,是指当兵、转正、推荐工农兵学员,我样样无份;所谓喜,那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,我时来运转,金榜题名。

## 39 未雨绸缪大学梦 .....龚 玉

这年冬天,在朝阳区工人口片的考场内,环顾四周充满着自信眼光的小弟小妹们,我心中忐忑不安。我有能力与

那些小我 10 岁的应届高中生们试比高吗？十年来，社会的整体应考水平有多高？我自己在这其中又处于何等位置？心中真是一点数也没有。

#### 48 1977：个人和民族的“诺曼底登陆”……郭 方

我知道自己能参加高考时，离考试只有 25 天了。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“黑户”，我还是以“待分配知青”的身份报了名，最后以 375.4 分考入北京大学世界历史专业。

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是北京高考总分第一。这是 20 年之后，《北京日报》记者为采访我，在市高招办查阅 20 年前档案才知道的。

#### 55 怎能忘怀我的南开……韩小蕙

全班 76 人，从“老高三”到应届，全有，最大的 32 岁，最小的 16 岁，居然差了一半。上学前的身份嘛，有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、教师、编辑、售货员、机关干部、学生……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有好几位都已成家，有了儿子闺女。还有一位老大哥，他进大学，儿子进小学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父子兵，在他的家乡和我们学校里传为美谈。以我 24 岁进大学、28 岁毕业的大龄履历，可当时在班里只能算个中等。

#### 70 时代变化与个人命运……雷 颐

得此消息，我当然也想报考大学，家人也来信希望我能报考。但是，部队毕竟不同于地方，不能随便报考，由于我们部队没有名额，所以无法参加 1977 年高考。这时我当兵已满三年，便动了想退伍考学的念头。

## 76 命运的转折点——难忘的一九七七年……李 斧

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,那时刚刚进入成年,对于那时候出现的每一件新鲜事,都感觉到由衷的喜悦。但是千喜万悦莫过于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了。“初闻涕泪满衣裳”和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则是那时心情的贴切写照。最初得到的是小道消息。刚听说,我就打电话告诉父亲,接着又骑着自行车去向各亲朋好友通报。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多天都不能安下心开始复习准备。

## 89 难忘的高考岁月 ……………[美]李 强

其实严格说来,那年的考题并不太难,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。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些学生来说,却是犹如上刀山下火海。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。最后,湖北省普通考生录取线为160分,在校生则高出许多,以致录取者有如凤毛麟角。

## 97 怀念1977——我梦想实现的日子 ……………李霄凌

第一天上午考政治。最后的一道是论说题:请驳斥“老干部是民主派,民主派就是走资派”谬论的反动性。这可是正中下怀!我提笔自如挥洒,把那页看到的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的观点,几乎没有遗漏一一写上了,真叫痛快!

## 106 1977年和一件难忘的往事……………李玉琦

在开始复习的时候,我本来准备考理科的,因为我天生性不喜欢文科。但是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,又传达了一个规

定,说25岁以上的考生必须有特殊贡献才能报名。所谓特殊贡献就是指考理科要有创造发明,考文科要在公开的媒体上发表过文章。而我阴差阳错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脑袋一热,给省电台写了一篇大批判稿。结果还被采用了,因此我获得了报名的机会。

115 1977 年底的高考 …………… 孙文决

男知青一大帮人去车站送我。我们村考上四五个,这么多人歇工去送的就我一个。上了长途车,望着建新、治宇、京生、张融这些好哥们儿的身影,一时也是百感交集,不知该说些什么。插队两年,就这样结束了。他们还要在农村,等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的招工。

123 我的困惑和我的大学 …………… 吴 思

干活的时候,如果有人站着聊天,半天不动弹,我就吆喝一嗓子:“动弹啦动弹啦,要聊回家聊去!”再严重点,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。如果有谁反抗,顶嘴带脏字,我就扣他的工分。我对社员如此凶悍,以致我们队的小孩哭,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:“哭,哭,再哭吴思来啦!”

147 1978 年之冬 …………… 肖复兴

那天中午,我到学校的传达室接电话,不经意间看见电话机旁边有一张当天的《北京日报》,报纸的下方登载着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启事,因为有中央戏剧学院这几个字,一下子分外醒目。中央戏剧学院,它也开始又招生了?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12年前它招生时的情景……

## 156 恢复高考亲历记……………薛庆超

常常是一个考生找到一份某科的高考复习资料,就用复写纸复写几份,分给众人,资源共享。大家拿到手就背,回过头看,也有不少笑话。比如一份高考数学复习资料的第一道题是:什么是数学?举例说明数学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?在物理、化学等科的高考复习资料中也有类似的题目,只不过把数学变成了物理、化学等。

## 168 “摔跟头”主题四个乐章……………杨慧林

1977年,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地解散,重新改为国营农场,我同另外两位曾经一起在兵团以弹琴鼓瑟为业的的朋友回到北京。那时少年气盛、自视甚高,因此恢复高考时大家只是相约报名,却并不在意功课,每日仍然是“夙兴夜寐,咏而归”,甚至有闲暇演练莫扎特弦乐四重奏、巴赫“双小提琴协奏曲”等等。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谁也没有考上。直到1978年才皆大欢喜,各有所归。

## 171 想上大学的日子……………叶兆言

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大学,读什么无所谓。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,我在中学时,自我感觉化学很好,于是就想到要学医。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,也没想明白。反正一听到恢复高考,机会来了,很自然地就机会主义起来,连忙拿起化学课本,还专门去一个老师那里补习数学。很多人都奇怪,为什么没有想到去考文科,在后来的日子里,我不断地回答这个问题。

## 180 1978年的夏天……………袁 晔

除了技术科的老大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，我们是工人中文化高的，自我感觉良好，都跃跃欲试。

同车间要好的师傅劝我，考大学干吗？国防工厂工作稳定，比上大学强多了，要是再来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大学生还没准儿下放农村支援边疆，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。

## 189 重返精神故乡……………周国平

在初试后的一个多月里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，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经开始绝望了。忽一日，北京来了两个人，据说是来搞我的政审的。晚上，他们到农机厂的破屋子里来，一位是哲学所伦理学室主任刘启林，另一位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熙成。薄熙成是薄一波的儿子，他把他们在县组织部的遭遇当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诉我：由于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县党校，组织部拒绝接待，他转身重填了一张空白介绍信，才被接待。

## 201 那个命运突变的美好时光

——纪念中国高考恢复 30 周年……………周 星

1978年夏日，烈日炎炎，在福建三明化工厂精工车间，我突然接到福州母亲的电话：“收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，快回来。”那时，我正沉浸在学习钳工的初级阶段的兴趣中，满心里期望8年成就为地质队最有技术含量工种的高手，此时一个电话让我立刻感觉到心脏跳动，预感到命运就此可能要改变了。

# 遥远的高考梦

◎ 蔡 震

现在人们只记得 1977 年全面恢复考试招生,其实 1973 年也曾摆出经考试录取大学生的架式,不然,怎么会出了个“白卷英雄”呢!我在那年“有幸”亲历这场历史闹剧,留在心上的刺痛则久久难平。

我是在前一年未经招工,从插队的农村进了县城,来到税务局的,报到之后开始工作却已是 1973 年初了。大学招生开始时,刚刚工作半年,而报考的第一关是要单位通过举荐,而且报考名额是按单位系统分配的。这对我犹如一道雄关。

首先是“政审”,那年头样样事都是先审查政治身份。父亲还戴着一顶“文革”发的“帽子”,我的政治身份算是“可教育好子女”,这事儿可就有点悬在半空里。“可教育”和让不让你接受教育,那是两码事。“教育”跟“教育”的涵义不一样。其次就是,那年头办事已经得走门路了,虽然“后门儿”一词似乎是再晚一点才有的。我刚到单位半年,人也才刚认熟,旁人还没认熟我,而我又是那种拿着烟酒都说不出

“您留着用”这句话，却好像揣着脏物似的人。

虽然有此一关，为自己圆一个大学梦的强烈渴望，还是激励我去闯关。在农村“修理”地球几年都没有淡薄下去的心愿，怎能让它失诸交臂呢！

局长在我的感觉中是个很世故，很有城府的人，说起话来面面俱到，滴水不漏。怎么向他开口，而不致让两句冠冕堂皇的话就驳回来，着实让我费了一番心思，却还是不得其解。局长又是个爱喝上两口的人，要不要送上两瓶酒，也让我颇为踌躇。犹豫良久，还是我行我素。直截了当地向局长诉说了我要上学的愿望，很真诚的，没讲那些时髦的、任谁都能信口拈来的话。末了，倒是说了句“考不上，我会踏踏实实在这儿干下去”这样意思的话，虽隐含着几分无奈，也还是真诚的。



※在窑洞里坐在自制的躺椅上读书

原以为局长既不会马上同意,也不会立刻拒绝,总要说些“研究研究”、“可以考虑”之类的话。然而,局长静静地听我讲完后只说了两句话:一是同意我报考,二是财贸口只有两个名额,他会为我尽力争取。这让我一时大为感动。果然,单位在准备报考的人中,只推荐了我,财贸口两个报考名额也给了我一个。

后来我想,在时兴讲套话、讲八股式冠冕堂皇的话的年代,还得真诚才能换来真诚。当然,这也要平时一贯做人、做事都是真诚的。我被招工来这个单位,是不大情愿的,我毫不掩饰这一点。但工作中我尽心尽责,而且努力做最好的,在同来的年轻人中,我是最先在业务上独立成一把手的。这些,局长肯定看到了,不然,他不会在我失去入学机会后,马上送我去省财院的业务培训班。这样水平的培训机会,在当时很少。那次半年的学习,使我回来后很快成为业务上的骨干,而且不久即被借调到地区财政局,实际上主管起全地区的税政业务工作。此为后话。

报名问题解决了,似乎该准备考试了,可实际上没什么可准备的。既没有考试的范围,也没有复习的资料。单位中有刚离开校门不久的青工,还有当地中学“复课闹革命”所用的课本,找来翻了翻,终是不得要领。反正大家都一样,听其自然吧。

时隔久远,怎么考的试,考了些什么,一点印象也没有了,大约从考试本身没有感到任何压力的缘故吧!成绩并不公布,但小县城里没有打听不出来的事。朋友告诉我总分在前六名之内,全县录取名额有十几个。考中,似是板上钉钉了。然而,就在此时,报上报道了那位交白卷的“英雄”张铁生,考试录取大学生,成了逆“革命潮流”而动的回潮。原来招生工作的进程,延缓了一个多月,成绩不看了,大概政治身份又成为最重要的录取标准。那笃定是落榜!后来听说成绩在前若干名之内的,大多落榜,许是防患于我们走“白专道路”之未然吧。

其实,如果没有最初的期望,也就没有之后的失望,心中的沮丧可

想而知。还不只是沮丧。因为在此之前，尽管学校被“文化大革命”闹得一塌糊涂，我们也都送到农村接受“再教育”，但我一直相信“再教育”有结业之日，相信有重新得到正规教育之时。这一次的遭遇，真正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绝望，心一下子跌进冰窖中。后来，坐在省财院培训班教室里，想着这大概就是自己惟一与大学打交道的机会，不禁黯然神伤。

培训结束后，回到税务局，我继续过着小县城的城里人的生活。

不过，这城里人的工余生活，其实和在乡下插队时没有多大区别。县城里有家电影院，可翻来复去放映的老是那几部片子，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其中的情节、对话。隔壁银行的会议室里有台19英寸的电视机，黑白的，这在那时已经是稀罕物了。人熟了，每天晚饭后可以去看看，当然是人家放什么就看什么。其实，除了球赛，倒也没什么可看的，无非消磨晚上的时光而已。当时的球赛只有乒乓球和羽毛球，那是我们最得意的体育运动项目。

更多的时候是打扑克。“拱猪捉羊”、“敲三家”，也玩“升级”，以分数计输赢，但与钱无关，不像如今人们打麻将。输者脸上贴纸条、头上顶纸帽或钻桌子，一脸的坦然。局长也玩，输了也钻桌子，没大没小，没上没下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还有就是花一两个小时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晚餐。我们这些单身职工住单位的集体宿舍，宿舍、办公室在一幢小楼里，顶上一层是宿舍。每人一个小煤油炉，不过都烧柴油，柴油便宜，而且容易搞到不花钱的，大家都有点这方面的关系。一个月38元的工资，只能精打细算，能措油就措油，管它谁的油。每逢一个小煤油炉点起，整幢楼里便从上到下弥漫了油烟味、葱花香、肉香，响起了叮叮当当、滋啦滋啦的锅碗瓢盆进行曲。这是当时小县城里机关单位常见的一景。还有办公、宿舍在同一孔窑洞里的，那就是公事、私事一起进行，更方便了。

说是可口的晚餐，其实不过是现在最寻常的家常便饭而已，一张葱油饼、一碗蛋炒饭，炒个木须肉或是过油肉什么的，已属奢侈了。往往这时，楼下后院里食堂的大师傅就急了，用炒勺敲着锅沿吼起：“谁还没打饭！”他是怕锅里那永远的土豆、萝卜剩下，改日更没人吃了。后来，就实行了预先登记，量人做饭菜，谁登记了，不要可不行。

自己做顿饭，也不是天天能行的，即使有那个兴致。按月供应的油、蛋、肉，数量极少，而且不能保证。有了，也在食堂管理员手里攥着，要不出来的。只有托关系、走后门，买上几斤肉、蛋，半袋白面什么的。我们这些家在北京的知青，每次探亲归来，都要大包小包地带些食品，甚至大米，北京的物资供应毕竟远远胜过偏远之地的小县城。于是，做饭似乎成了一种享受，除了果腹、解馋，还带米一种精神上的消遣、乐趣。那几年对于做饭，可谓乐此不疲。

县城小干部（那时不叫公务员）的生活，就这样日复一日。虽清苦些，但远非在农村插队时受的苦（陕北话的“受苦”即是劳动之意）所能比，偶有插队的村里老乡进城时来坐坐，他们总会啧啧感叹：“你可享福了！”可我却越来越觉着生活的乏味，不禁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些小公务员灰色的人生。是的，如果用一种色彩来表现那时的生活，只能用灰这个颜色。没有五彩缤纷、眼花缭乱，没有激情，没有活力。这倒不单是因为物质生活的匮乏，而是在那个年月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精神生活的枯燥、压抑。

终于传来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消息，人人都像松了一口气，那已是我进城的第四个年头了。生活的气氛虽然松快、明朗了许多，但或许因为时间的惯性，生活的方式和内容依然如故，还是那么单调，水波不兴。

转眼就快到春节了，人们传着说，正月里要闹大秧歌。小城里有点什么事，很快就能传遍了，不亚于如今的互联网。听了，着实兴奋起来。

早就在村里听老乡说起过以前正月里闹大秧歌有多红火，从初一到十五，十里八乡的秧歌队都要到城里去闹，比着闹。我决定不回家了。那些年的春节，除了天各一方的家人、两地分居的夫妻（这情况几乎家家都有）短暂的团聚，而且大多是带着春宵苦短、来日苦多的心情的团聚，中国人最看重的这个节，似乎已经没有别的文化涵义，完全“革命化”了。当然，到了年底，会有许多新的生命诞生。

那年除夕好像是在局长家里吃的年夜饭，他把我们几个没家的单身汉都叫去了。只是饮酒、吃饭，那时没有晚会、电视节目之类的娱乐。打杠子、划拳，吼了一通，也就早早睡了。初一上午，还躺在床上看书时，就听楼道里有人喊：“大砭沟的秧歌队来喽！”侧耳听，果然从北关方向传来锣鼓、唢呐的动静，楼下街上也渐有人声喧闹。赶紧穿戴了下楼，门口已是熙熙攘攘、锣鼓震天了。原来秧歌队在这儿拉开了场子，我们这幢楼的所在算是“市中心”。

领队的大概有四五十岁，一副饱经沧桑的面容，手里握把旱伞，上下挥动，类似军乐队的指挥棒，打开又是一件道具。腰鼓队多是后生，没有特别的装束（不像如今的腰鼓队），黑袄、黑裤而已，连鞋都是平日里爬山越梁穿的，略新一点罢了。只有头上扎的那块雪白的羊肚毛巾和鼓槌上舞动的两段红绸子，一下提起了人的精气神儿。赶驴、跑旱船的倒是穿起了服装，红红绿绿的。虽然旧了，褪了色，毕竟在一片蓝、灰（那年月的色彩）之中，涂抹出几分喜庆。

领队踩着锣鼓点，带着秧歌队变换着队形走场子。也许是在酝酿情绪，也许是多年没扭生疏了，那步子好像怯怯的、小心翼翼的，人的表情也显得木木的，就像平日里在山上受苦时的样子。我正感觉有点失望时，领队的人唱了起来。耳朵一激灵，多么熟悉的旋律，久违了！那是李焕之的《春节序曲》，“文革”前每个除夕夜，广播电台晚会节目的第一支曲子。自从若干年前，音乐界学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